

徐宗泽的天主教救国思想

□李丽丽

(香港中文大学 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中国 香港)

摘要:“救国”问题是近代社会的主题。天主教在近代中国被称为“帝国主义先锋队”。徐宗泽(1886-1947)是近代重要的中国天主教学者之一。徐氏从天主教教义层面一方面为天主教作辩护,一方面则致力于唤醒教友的爱国意识。本文以“救国”为主题,整理不同时期他关于救国问题的论述。笔者尝试系统地勾勒出他所构建的救国观:首先由人的“现世暂福”证国家之重要性,其次以“家”喻“国”辨“爱国心志”,最后则提出“抗战”乃天主“预见预许”的公义之战。

关键词:徐宗泽;天主教;救国

[中图分类号] B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47 (2010) 01-0120-03

徐宗泽(1886-1947)乃名门之后,是徐光启的十二世孙,也是近代中国天主教界的重要学者之一。1905年,他参加科举考试,举秀才。科举制被废后,追随家族信仰,成为耶稣会初学院修士。^[1]继而,游学于欧美,期间晋升为司铎,并获神哲学博士。此后回国服务中国天主教事业,任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主任和《圣教杂志》主编。“其学精中西,不但能介绍代表西方文化最高峰之神学,且能发扬中国固有之文化道德,其所著《神学提纲》……为空前创制,贡献巨甚。”^[2]因此,探讨徐宗泽从天主教教义层面提出的救国思想无疑对汉语语境的中国天主教社会思想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甲午战争的失败让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愈发意识到“救亡图存”是首要的社会任务。20世纪初,梁启超最先将“国家”观念引入中国,宣扬了西方国家主义思潮中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观点,从此,“爱国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在此时代背景中,天主教传教士被指责为“帝国主义先锋队”,教友们则更被扣上“帝国主义的走狗”称号。^[3]这其中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而更为根本的是天主教教义与近代中国时势之间的冲突。具体表现为:一是以大公主义(Catholicity)为标识的天主教与民族危亡时期“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国家观相矛盾;一是罗马教廷当时主张教友对世俗政治事务持消极对待的态度,则引起反教人士籍“不能谈论政治”为由责难天主教教友在民族危亡时刻对国事漠不关心。

国家主义思潮(Nationalism)19世纪在欧洲各国兴起,20世纪初由梁启超引入中国。罗马教廷从一开始就对该思潮不抱好感,源于该思潮在鼓励意大利成立民族国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2年,庇护十一世(Pius XI)颁布了

《深奥难名》(Ubi arcano)通谕,将此思潮定为一种“过火的”国家主义,应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国际精神。秉承此精神,在20世纪20年代,徐氏针对国家主义思潮发表的文章中,多是照本宣科地按官方立场劝诫教友。“轻视之,似国家主义实为爱国主义之代名词;然而有不同之点”,“完全为这国家而牺牲,……民生,个人,家族,人类都是牺牲品了”,“要而论之:国家主义乃一种绝对底爱国思想,出于正理底范围”。^[4]

此时,徐宗泽尚未意识到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国家主义乃一贫弱国的国民,见内或外患,迫集中己国,遂发生爱国心、救国心,欲奋振己国也”。^[5]在这个阶段中,徐氏从一开始,他就提倡国家主义中的爱国思想,“国家主义苟爱国而有理性以范围之,甚合乎正道者也。持国家主义者尤亟以宣扬国光,拥护国格,使吾国在列强中有光荣之地位,此亦合于理性,为国民者所当尽之本分也”。^[6]

九一八事变后,他逐渐意识到了中国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就此提出国家天生就拥有造物主所赋予的独立自主和不受侵犯的主权。徐认为组成国家的核心在“国家当有统权”,因为国家的宗向在“为人民谋现世之幸福”,而“欲达到此宗向,不能不有一有权者”。纵观国家发展史可知国家“皆有一统权”,而“统权”又来自造物主,因而不可侵犯,“造物主为权柄之最终原因”。以此为铺垫,他进一步地明确其中国家与教会之间微妙关系的处理。20世纪初的中国正致力于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这无疑激化天主教在中国的“国家与教会关系”矛盾的一面。在提升国家地位和主张国家主权独立之同时,必然产生应如何平衡国家与教会的天平之问题,教友又应如何调和“爱国”和“爱教”之两难抉择。

[收稿日期] 2009-07-31

[作者简介] 李丽丽(1983-),女,广西钦州人,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近代中国天主教思想史。

在徐看来,最高“统权”是主权,它的特征在“独立”,不隶属于别的权力之下,徐有两点看法:一是教皇主权与耶稣基利斯督之主权不同,“缘耶稣创立圣教会,其权天主而人之权也”,教皇仅为代管之权,还不是天主之权。另一则是教皇之权仅关涉“关于神灵超性之事”范围;而国家遵照人伦秩序,管治人类伦序之世俗事务。

至于国家与教会之间的交往则应以遵守互相尊重各自“相对地独立主权”为前提。具体而言有三个原则:^[7]“一,纯然在圣教会范围中之事,则圣教会独有其权,国家不能置喙;二,凡纯然在国家范围之事,圣教会亦不可顾问;三,凡事有关于圣教会及国家者,则彼此间互商互助,亦不妨害彼此权利为前提,惟圣教会保有其指导训诲之权”。按此,他主张政教分离,相对独立,但应相互协调合作。

进而他劝诫教友不要将国家与教会视为分庭抗礼之对立体,教友入教并不代表他放弃国民资格及其应有的国民权利义务,在教信友受治于教皇、主教和神父仅是依神事而言。天主教教友具备“基利斯当(Christians)国民”的双重资格。

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徐遵循天主教传统的训导而主张应以“和平之法”实践爱国,“欲中国民族之振兴,打倒帝国主义,诚为国民急要之任务;然打倒之法,终须出以和平,范以正道”。^[8]其中,不能忽视的原因是在徐宗泽年代的罗马教廷主要倾向于以谈和平代替“公义战争”之必要性。然而,至七七事变,他对战争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化被动劝阻为鼓励主动参与,“战争能为复兴民族,复新民德之至善机会”。

简言之,徐的救国方案之形成历经了三个阶段:意识到“国家”的重要性后,致力于唤醒中国天主教教友的“爱国心志”,至抗日战争时期则提出了以战争的方式来表达爱国之情。由上论述我们还可看出,但凡论及“救国”问题,无论国家主义还是战争救国,都不同程度地与当时天主教的官方立场存在冲突。而徐氏的救国思想正是在为这些冲突、矛盾提供教义上的解读形成,以适应中国处境对天主教教义的需求。

在徐氏救国方案的指导下,他首先通过指出实现人的“现世暂福”之重要性来论证“国家”在天主教教义中亦有其独特地位。“梵二”前,教廷强调人在“天国”的生活,教会对人在现世的利益持消极否定态度,多关心人在精神方面的事情。徐氏在《天主造物·四末论》中就提出天主造人的终向是人死后到天国享受“天福永福”,“人生在世,原为升天享福,死时灵魂上有圣宠,无旧污之洗伐,则升天国”,则人生“终点之所向,身后之福耳”。然而,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人只有在现世实现“暂福”才能“梯及”于“身后”的永福,以现世“暂福”与永福、天福的实现之间的关系突出人在现世的幸福之意义,“……身前之世福,暂福,苟善用之,即能梯及身后之天福,永福”。并且“人为肉体与灵魂的结合”,则世福与永福之间为隶属关系。他取奥古斯丁之灵魂不灭说,指“灵魂为神体……离开物质而能存在,而能工作。……虽肉身死亡,而仍自然存在……即所谓之不死不灭”。^[9]人死后的“永福”之载体主要在人的灵魂。于是,人可因其灵魂的不死不灭而使现世得到的幸福

递延至后世从。

在论证了人应重视现世生活的幸福后,徐氏指出国家在实现现世幸福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徐看来,国家是最完备的社会,是辅助人实现“世福、暂福”的最理想组织形式。他虽没直接表明“国家至上”,但他已充分论证了保障国家正常运作的必要性,虽然“未有国之先,已有其为人之权”,只是“有国,而更得其保障”。

必须说明的是,按照同时期天主教官方的立场,人与国家的关系应是“在这个阶段(现世生活),我们亦不能求助于国家”。可见,当时罗马教廷不仅对人在现世生活的价值消极对待,并且不鼓励鼓吹国家对于个人权利实现的价值。而通过上述分析,徐氏给出了适应中国救亡时期的天主教“国家观”诠释,即在现世是人享“永福”的必经途径基础上提出国家是保证全人类“世福”得以实现的“最完备”组织。

其次,徐宗泽采用了以“家”喻“国”的思路来为教友应具备“爱国心志”进行辩护。当时的天主教官方教义《新事》通谕,强调“家庭权利先于国家”,家庭是最先的“社会”形式,……家庭的权利义务自然地先于国家。然而,20世纪上半期,近代中国的“国家优先”使得家庭显得微不足道,这与重人权和家庭权利的天主教教义难以协调。此时,徐一方面要为天主教官方立场作辩护,即为天主教家庭观念提供新的论证。另一方面处于民族危亡的中国局势又促使他意识到要唤醒教友们爱国情怀。

在“国族”、“民族”年代,徐氏提出家庭仍有其时代意义:一是家庭“涉及于国族民族之兴亡”,因“有好家庭,乃有好社会,好国家”;二是家庭产生于具超性意义的婚姻圣事,从而家庭在天主教教义体系中具超性价值,而此超性意义使得她的“根基”地位可超越时代变迁之考验。接着,他以自然律诠释了家庭“先于”国家之说法。“夫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家庭;家庭者夫妇子女所组成”,“家庭非他,社会之细胞”。

在他看来,家庭“先于”国家产生,国家实则为更完善、更大的家庭,“国家之观念由家庭与家乡之观念,扩大而成;盖集家而成一乡一县一国;故国者家之扩张体也”。^[10]由此他提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存有对“家”的强烈依恋感,“我之家屋,令我兴起我家婚丧喜庆之种种纪念;我家之一几一桌,一门一户,莫不与我以甘饴之安慰;令我居之而不忍他适也”。^[11]此“恋家”之情很大程度形成于中国家庭“家人”间关系的紧密,“家中之一切大小事情,……与我皆一体相关”,则爱国心亦是在国家与国民之紧密关系上发生。同理而推之,此“爱家”之情必会衍生出“爱国”之心。就此他提出了“爱国心”论说:“国家之心志,其最要者爱国心。……爱国心,即是爱吾所生,所居,所长之国。”^[12]“国与有我之休戚相关,无异家之与我;我之当爱国,无异之当然爱家。……故我亦当以相同之爱,爱我国之人民,土地,主权,犹爱我家之人,我家之物,我家之事也。……只要爱,合乎理,顺乎性,不侵犯公义,不违背公理,则无往而非是也”。

在此,以爱家之情通感于爱国之心,“故爱国心即是爱

家心之扩大者；人不爱其家者，即无不爱其国者。故曰爱家，即于爱国：爱家族，即是爱国族，爱民族。^[13]就此思路，他论证了国家具其独立主权的正当性。家庭有“一家之长”，有“父权”，而扩张至“大家庭”的国家，其“血缘关系无从可考……惟政治关系，即受治于同一之统权，而成一国族”。

在以上的诠释中，徐氏并未否定天主教家庭观，只是他还从中国处境中突出教友更应有其“爱国心志”。在重申家庭地位的同时，他呼吁教友以“爱家”的情感唤醒教友保家卫国的爱国心，实际上，徐宗泽的爱国论说是围绕调和天主教教义与近代中国于家庭权利与国家权力问题上的分歧而展开。

最后，他提出了“抗战”是天主“预见预许”的“紧要”“公义”之战，则身为中国天主教友则应主动参与于抗日战争中。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思潮随之兴起。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此时，爱国心更突出表现在抗日战争上。然而，天主教教义向来主张和平，反对武力战争。尤其在20世纪上半期，尤其在经历“一战”冲击后，罗马教廷对战争愈发反感、排斥。^[14]国内质疑天主教反战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就此指责中国天主教反对抗日。

徐氏视战争为“变态”社会现象，“战争为扰乱社会和平，人类伦序之天大祸患，故当极端以避免之”。战争根源于天主赋予人的自由意志，是人因私欲滥用其自由之权所造成。然而，“抗战”虽不由天主所造，亦不为天所欲，却早已为天主所预知、预许。“将来之事情既属于人自由之意志，则事情未实有之前，则人之意志常能自由”，然天主“为无穷美善……无始无终，永远常然，固无过去，现在，将来之区别”，“人所兴起之战争，……天主在无始之始，固已预见之”。^[15]天主“全能”，可阻挡战争发生，但既给予人以自由选择权，则尊重之，此为天主所“预许”。

同时，徐亦指出发动抗战却非人为的“祸端”。考虑到战争既“由人而兴”，“故战争可从人方面以观察之”。天主赋予人之自主之权，人既可为善立功，亦可兴祸患，凭人自由意志之选择。根据参与战争之人的动机，战争可分“无理觉情冲动”和“合理尽义”之战。其中，“合理尽义”战争是指“以保护被侵之权利，与夫维持社会秩序之宗旨而战”。在此，他以奥古斯丁的战争观为天主教传统立场，重新提出“公义之战”（Just war）的合法性，“然有时为恢复被侵犯之公义与正理，战争亦有不得不然者”。

徐宗泽结合中国的时势提出“紧要”战争观。“紧要”，意为“最后关头”，“不得不”。具体指三个因素：^[16]“一，一国之独立主权被蹂躏时；二，一国国土之完整被侵略时；三，一国当有之尊敬及光荣被侮辱时”。而战争一旦成为“紧要”，则为光荣之事，“战而为求恢复国家不能不有之幸福”，其中“国家不能不有之幸福”实则为国家在国际法上应享的独立主权。“紧要”战争观突出了保卫中国主权完整和民族独立之迫切性，这就从抗战发动的原因上说明了“抗战”为“公义”之战。则参与抗战不妨害人们得“身后永福”，源于天主对此作了“转祸为福”的安排，“天主

注意于我人本性上的事，如超性上的事一般，不过有从属之别，先后之次序”。抗战是“公义之战”，则支持抗日战争必可在“将来的天国得赏报”。

徐氏将抗日战争总结为：“非天主所欲，天主不过不欲妨害人之自主权而准许之耳；但此准许亦在天主上智布置之中，故与天主上智不相抵触；天主且能从战争之祸，造福于人也。”^[17]他通过赏善罚恶之功劳论呼吁、劝说教友和人们更多地支持并参与抗日战争。相较而言，当时罗马教廷对“战争”无明确的官方立场，教宗庇护十二世1939年发表的《圣善甘美》通谕（In questo giorno）也因波兰战事而批判战争呼吁和平，“公义战争”的说法反被搁置。

综上所述，徐宗泽针对中国救国问题提出了不少与当时官方天主教社会训导立场不相一致的观点。可见，徐氏的天主教救国思想对当时教廷态度所造成的限制作了一些“中国化”的变通以适应中国处境的需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徐宗泽是在当时天主教官方教义颁布的社会训导基础上提出他的“中国化”调整主张，而他的调整正是为了维持天主教信仰不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才作出具前瞻性的调适、尝试。就此可言，徐氏的“中国化”救国思想并没有导致对天主教传统忽视、抛弃甚至背离传统。而正如西格·伯尔曼（Sigurd Bergmann）所提出，“应以一个动态的视角理解‘传统’”，应重新审视的是“传统”概念本身，即传统并不意味着永恒不变，而应在变化与延续之中保持。^[18] ■

参考文献：

- [1] 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台北：中华书局，1988：323.
- [2] 京沪二地违悖徐宗泽神父.益世周刊（第29卷），1947，8（4）：50.
- [3] 天主教是帝国主义么？圣教杂志（第16卷），1927，5（5）：193.
- [4] 徐宗泽著.国家主义的评论.圣教杂志（第15卷），1926，5（5）：223.
- [5] [6] 徐宗泽著.国家主义索隐.圣教杂志（第15卷），1926（9）：356、357.
- [7] 社会学概论，第186页.
- [8] 徐宗泽著.天主教与近今之政党.圣教杂志（第16卷），1927，10（10）：440.
- [9] 徐宗泽著.天主造物论·四末论，第48页.
- [10] [16] [17] 徐宗泽著.战争与爱国.圣教杂志（第26卷），1937，11（11）：646、642、645.
- [11] [12] [13] 社会学概论，第182页、第123页、第125页.
- [14] Kenneth R Himes.War.The New Dictionary of Catholic Social Thought, edited by Judith A.Dwyer, Elizabeth L.Montgomery.Collegeville, Minn.Liturgical Press, 1994: 978.
- [15] 徐宗泽著.天主上智毒毒之战争.圣教杂志（第26卷），1937，12（12）：706.
- [18] Sigurd Bergmann, God in Context: A Survey of Contextual Theology.Aldershot, Hants,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3: 53-57.

责任编辑：邱枫

徐宗泽的天主教救国思想

作者: [李丽丽](#)
作者单位: [香港中文大学, 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中国, 香港](#)
刊名: [理论界](#)
英文刊名: [THEORY HORIZON](#)
年, 卷(期): 2010, ""(1)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13条)

1.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1988
2. [京沪二地追悼徐宗泽神父](#) 1947(4)
3. [天主教是帝国主义么?](#) 1927(5)
4. [徐宗泽 国家主义的评论](#) 1926(5)
5. [徐宗泽 国家主义索癘](#) 1926(9)
6. [社会学概论](#)
7. [徐宗泽 天主教与近今之政党](#) 1927(10)
8. [徐宗泽 天主造物论·四末论](#)
9. [徐宗泽 战争与爱国](#) 1937(11)
10. [社会学概论](#)
11. [Kenneth R Himes War. Judith A Dwyer. Elizabeth L Montgomery The New Dictionary of Catholic Social Thought](#) 1994
12. [徐宗泽 天主教上智亨毒之战争](#) 1937(12)
13. [Sigurd Bergmann God in Context:A Survey of Contextual Theology](#) 2003

相似文献(1条)

1. 学位论文 [徐文华 徐宗泽的生平著述及其思想研究](#) 2005

徐宗泽是近代外国耶稣会在上海培养的一名天主教知识分子,作为明末清初中国“天主教三柱石”之一徐光启的第十二世孙,他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天主教会内可谓贡献突出。他编辑出版了《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明清耶稣会译著提要》等历史著作,奠定了他是近代较早开始研究中国天主教史的历史学家的地位。徐宗泽还长期担任徐家汇藏书楼馆长,在担任馆长期间他积极收集各地地方志,利用其任职之便支持近代学人的一些文化研究工作。此外,他还在1923-1938年间主编了近代上海耶稣会机会报《圣教杂志》,《圣教杂志》是一份在近代公教报刊界中影响较大的杂志,徐宗泽担任主编后使其内容更加丰富,注重与读者间的沟通,使杂志呈现出世俗化、大众化的倾向。《圣教杂志》与徐宗泽一生的传教事业密不可分,他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关于宗教、哲学、教育、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文章。

本文的徐宗泽思想研究一部分在收集整理他各类文章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其的宗教教育及社会政治两方面的思想。处在20世纪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运动的历史大背景下,徐宗泽对当时公教教育界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是近代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运动众多支持者中一个默默无闻的实践者。同时,徐宗泽从公教角度对国家观、劳工问题、三民主义、战争与爱国等社会政治问题进行了分析,表现出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社会改良意识及强烈的爱国心,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总体而言,徐宗泽的生平著述及思想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的关怀,作为一个宗教信仰徒对于宗教信仰的虔诚,作为中国天主教内的一个文化工作者,用自己的行动支持近代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运动。这些都使徐宗泽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中具有较强的典型性。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11j201001050.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9460d638-e809-4416-b7c0-9e4d006f3b52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